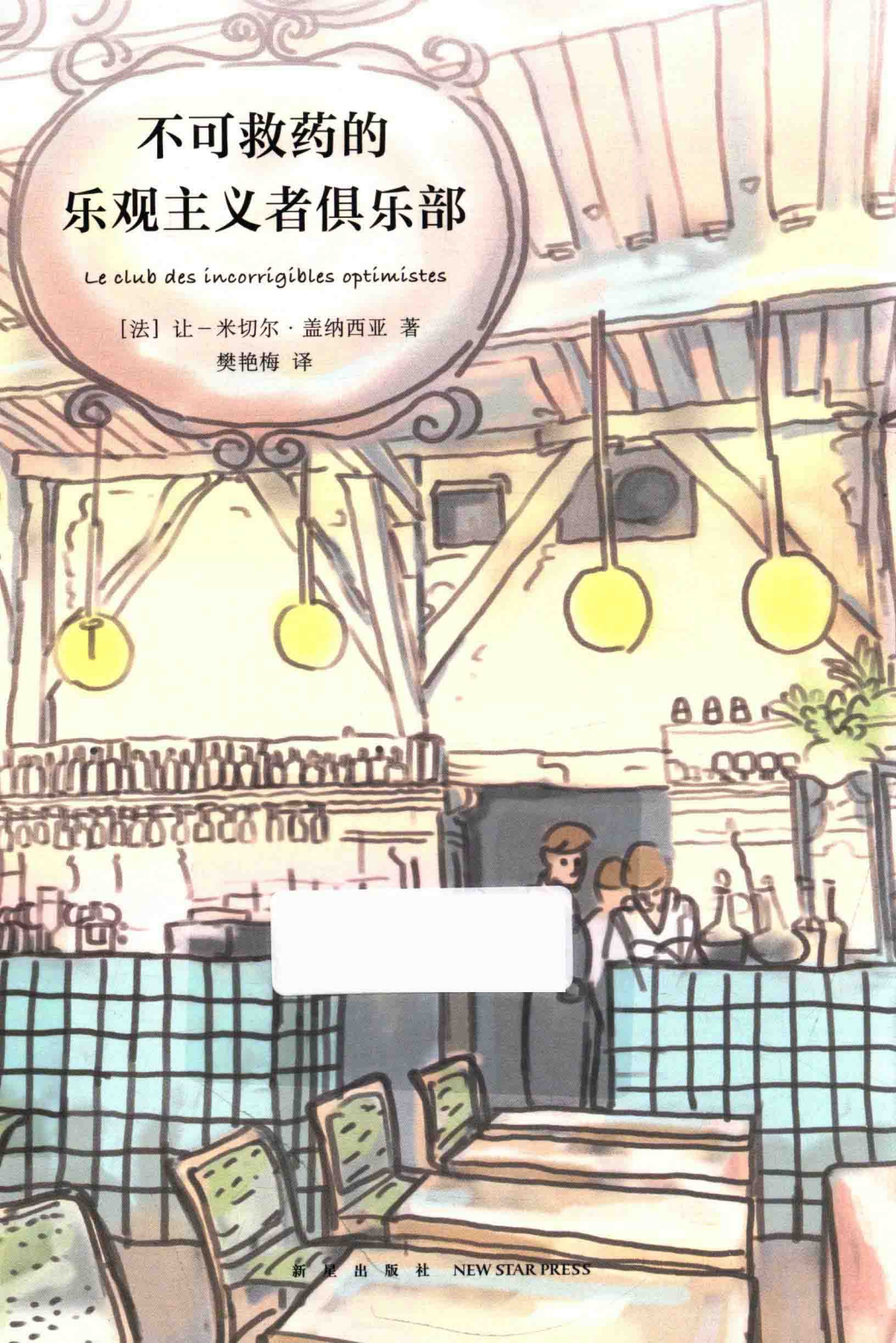


不可救药的 乐观主义者俱乐部

Le club des incorrigibles optimistes

[法] 让-米歇尔·盖纳西亚 著
樊艳梅 译



不可救药的 乐观主义者俱乐部

Le club des incorrigibles optimistes

[法] 让-米歇尔·盖纳西亚 著

樊艳梅 译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7-2164

LE CLUB DES INCORRIGIBLES OPTIMISTES

by Jean-Michel GUENASSIA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俱乐部 / (法) 让-米切尔·

盖纳西亚著; 樊艳梅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33-2526-4

I. ①不… II. ①让… ②樊…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0681号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俱乐部

[法] 让-米切尔·盖纳西亚 著

樊艳梅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管啸尘 王轶华

封面设计 徐蓉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出版 新星出版社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 88310888 传真 (010) 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 890mm×1270mm 1/32

印张 17.25

字数 530千字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526-4

定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1980年4月 / 001

1959年10月-1960年12月 / 011

1961年1月-12月 / 151

1962年1月-12月 / 219

1963年1月-9月 / 323

1963年9月-1964年6月 / 397

列宁格勒 1952年 / 509

巴黎 1964年7月 / 531

1980年4月



今天，有一位作家下葬。这就像一场最后的游行，出乎意料地来了很多人，他们沉默而虔诚，混乱无序地堵住了蒙帕纳斯墓园周遭的大街小巷。来了多少人呢？三万？五万？更少？或者更多？不管人们怎么说，葬礼上还是得有很多人参加，这很重要。假如有人事先告诉他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他的葬礼，他大概不会相信。他会笑出声来。这个问题并不会让他多在意。他希望自己悄悄地被安葬，身边守着十二个门徒，而不必搞得像雨果或者托尔斯泰的葬礼那样盛大。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未见过有这么多人来送别一位知识分子，这不得不让人认为这件事是必须的，或是大家一致认同的。这些人为什么都在这里呢？根据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本不必赶来。向一位一直深陷歧途、在任何事或者几乎是任何事上都会自我欺骗、坚持将自己的才智用于捍卫不可捍卫之事的人致敬，这实在太荒谬了！他们更应去参加那些“正确”的人的葬礼，那些他曾无比蔑视、无情批评过的人。然而，没有任何人会为那些人而去。

如果在失败背后，这个小个子男人身上还有别的可称道的东西，那便是这样一种激情：以思想改变命运，面对一切逻辑障碍仍然奋勇向前，明知会失败依旧不放弃，敢于承受正义的事业与注定失败的战斗以及周而复始而又毫无结果的斗争之间的矛盾。由于没法进到墓园里去，人们走过一座座墓、越过一座座碑、推翻一块块墓碑，只为离他的棺木更近一些。这简直就像是在安葬某个大歌星或者某位圣人。泥土覆盖的并不只是一个人，与他一起被埋葬的是一种古旧的思想。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深知这一点。不会有更美好的社会，不管我们接受还是不接受。在这里，我们怀着信念与失却的幻象，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墓穴。如此多的人聚在这里，就像是為了救赎理想主义犯下的错误而进行的特赦。对于牺牲者而言，这并不会改

变什么。不会有道歉、赎罪，也不会有盛大的葬礼。还有比想行善却作了恶更糟糕的事吗？泥土埋葬的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中生活并不容易。

此时此刻，不再清算什么了，也不再总结什么了。所有人都负有相同的罪责，所有人都有过错。我并不是为了思想家而来。我从来就不懂他的哲学，他的戏剧亦难以理解，而他的小说我也早已忘光。我是因为久远的回忆而来。但人群使我想起他曾经是怎样的人。人不能为一个站在刽子手那边的英雄恸哭。我半路折回。我会将他埋葬于脑海中的某个角落。

一些声名狼藉的街区会将你带回过去，最好不要在那里流连驻足。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因为再也不曾想起，然而其实只要回去就会明白，它一直在等着你。我避开蒙帕纳斯，因为那儿有我不知如何面对的幽灵。我在拉斯帕大道的侧道上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我认出了他那件独特的印着浅色人字形条纹的大衣，那是五十年代亨弗莱·鲍嘉^①穿过的款式。有些人我们看他走路的样子就能认出来。帕维尔·西布卡，东正教教徒，共产党员，思维极其跳跃，擅长讲不入流的笑话。他神色倨傲，不紧不慢地走着。我走到他前面。他胖了，大衣都扣不上了。一头乱糟糟的银发使他看起来像一位艺术家。

“帕维尔。”

他停下脚步，打量我，在回忆中搜寻着自己是在哪里见过眼前这张脸。我大概唤起了他对过往的些许模糊记忆。他摇摇头。我没有让他想起什么。

“是我啊，米歇尔。记得吗？”

他盯着我，并不相信，始终带着怀疑的神情。

“米歇尔？……小个子米歇尔？”

“别这么说，我现在可比你高了。”

“小个子米歇尔！……这得有多久了啊？”

^①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 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因为萨沙。十五年了。”

我们都说不出话来，因为回忆变得尴尬。最后我们终于拥在了一起，他紧紧地将我抱住。

“我可认不出你了。”

“可是你，你没什么变化。”

“别笑话我了。我有一百公斤重，全因为饮食。”

“真高兴再见到你。其他人没有和你在一起吗？你一个人过来的？”

“我正要去上班。我还没有退休。”

他那波西米亚式的长音听上去铿锵有力。我们一起去了塞雷克，一家小餐馆，那里所有人似乎都认得他。我们刚坐下，还没有点单，服务生便给他端来一杯浓咖啡和一瓶冷牛奶，然后才让我点单。帕维尔弯身去拿旁边桌子上装着羊角面包的盘子，他心情很好，吃了三个，虽然嘴巴里塞得满满的，还是非常优雅地说着话。大约三十年前，帕维尔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到了法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在最后一刻逃过了大清洗运动，而共产党前总秘书斯兰斯基以及他曾经亲密的合作者外事部部长克莱门蒂斯则被逮捕。帕维尔，前驻保加利亚大使，著有纪实作品《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外交与革命》，没有任何巴黎出版商愿意出版这部著作。现在他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一家旅店做夜间保安，平时就住在旅店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希望能和战争结束时移居美国的大哥重逢，正在等签证，因为过去的经历他已经被拒签过多次。

“他们不会给我签证的。我见不到我的哥哥了。”

“我认识使馆的一位专员，我可以和他说一下。”

“你就别操心了。我的文件可是和我一般厚哪！我似乎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建立者之一。”

“真是这样？”

他耸耸肩，认命的样子。

“你要是三十年代在布拉格上学，就会发现变革是显而易见的事。你要么站在剥削者一边，要么站在被剥削者一边。我并不是选择了阵营，而是因为本来就出生在这一阵营里。我年纪很轻，确信道理站在自己这边，

确信我们的国家没有其他出路。确实，我曾经是党内的一位负责人。我毕业于法律系，认为大众教育与电学会催生新一代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为共产主义会摧毁我们呢？资本主义，我们倒确信它会摧毁我们。战争期间，一切都显而易见。要么赞成共产主义者，要么赞成法西斯主义者，那些不做选择的人就倒霉了。大家都激情满满地向前走，我也没有任何的质疑。可是解放后，没有一件事是大家期待的样子。如今，我的朋友们被绞死了，我的家人深受折磨以至于不再认我。可是他们才不理睬，他们不想要一个老共产党员了，所以我决定要烦死他们。每年我都会递交一份签证申请，每年他们都拒绝。不要紧，我会继续申请。”

“告诉我，帕维尔，你还是共产党员吗？”

“我是，永远都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美好的思想，米歇尔。如果时间再多一点，杜布切克^①与斯沃博达^②应该可以做到。你看着吧，我的好运就要来了。”

“为什么？”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曾写信给杰米·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而他给我回信了！你明白吗？”

他从钱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封依旧装在原信封中的信，递给我。塞鲁斯·万斯是在1979年1月11日回的信，信上说他会将信转交给相关部门。

“你怎么看？”他问道。

“典型的官话。他并未真的有很多干涉。”

“二十五年里，这是他们第一次有回音。这是一种征兆。塞鲁斯·万斯并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位民主主义者。”

“之前，你一直都没得到回复？”

“我太傻了，我写信给美国总统，他没有时间回复写信给他的人。是

^①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 1921–1992），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②卢德维克·斯沃博达（Ludvik Svoboda, 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总统。

伊姆雷建议我写信给国务卿。”

“也许你找到了正确的路。如果他们还是拒绝，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不是捷克人，我也不是法国人，我是无国籍的人。这是最糟糕的境况，我等于不存在。但我还是抱着小小的希望，希望能再见到我的哥哥。他现在是美国人了，每年我们通一次电话，彼此问声新年好。他是建筑工头，已经成家了，过得不错。他没钱来欧洲。明年我会递交新的申请，后年也会。”

渐渐地，餐馆挤满了葬礼结束后过来歇息的人。一群人走到我们桌前，一个女人想要坐到我们旁边。

“这里有人坐吗？”

“有人！”

女人被他激烈的语气吓到，退了回去。那群人也离开了。

“我是在做梦吧！那些蠢货为了这个傻瓜而来，他们脑袋里是进屎了吗，还是什么？”

“这是一种象征。”

“要是我，我要去他的坟上撒尿。他不配得到别的什么东西。他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他不能自我否定。”

“他知道。纪德与胡塞之后就成了这样。我曾告诉过他斯兰斯基与克莱门蒂斯的事，他没说一句。他知道克拉夫琴科^①的事，是他强烈谴责克拉夫琴科有罪。你能解释这些吗，能吗？与狼群一起嚎叫，蔑视殉难者，否认真理，这难道不是同流合污吗？他是混蛋！”

他若有所思，额头前倾，面容纠结。

“以我所处的位置我不应该教训别人，我本不该说这些。”

“我不明白。”

“最基本的事是要懂得感恩，是他们给的钱让我们得以幸存。没有他们，我们早就完蛋了。”

^①克拉夫琴科 (Kravchenko)，苏联政府官员。

“谁给你们钱了？”

帕维尔瞟了我一眼，就像我在犯傻一样。随后，他发现我是认真的。

“凯塞尔^①和萨特，两个人都有。他们为我们找了些翻译活、零工，以此照顾我们。他们认识的人很多，将我们推荐给各个杂志、报刊的负责人。我们写稿换取工钱。如果我们没钱了，他们便会付钱给房东和执达员。我们哪有能力应付呢？我们一个子儿都没有，身无分文。如果不是他们的帮助，我们大概早就死在桥下了。萨特双目失明闭门不出时，情况就更艰难了。两年前，他们救了弗拉基米尔，你还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

“他那时麻烦事缠身。”

他忍不住对我讲述一番。“我在巴勒托餐馆的里间分发食物，正好看见弗拉基米尔·戈连科。”

“弗拉基米尔怎么了？”

“来西方之前，他管理着敖德萨的石油集团。他一到这里便获得了政治避难者身份。他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一家石油公司聘用他，哪怕是他熟悉的或者他曾有生意往来的企业。没有任何人愿意动动小手指帮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畏惧莫斯科方面的势力。如果他们雇用他，就是与莫斯科那些人为敌。他们对莫斯科人念念叨叨个不停，又和那些人做交易。玛库索，就是那个餐馆的老板，你应该记得，他是个勇敢的人，在达格尔街上的一家肉店为他找到了一间佣人房。弗拉基米尔替肉店老板算账，老板用香肠、熟菜之类的实物作为报酬。不过要说报酬，其实也算不上，弗拉基米尔很恼火，因为给他的那些东西是本来要扔掉的残羹冷炙。但我们大家还是会好好享用，弗拉基米尔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些食物。后来有其他商人请他帮忙，慢慢他便有了客户群，一切都很顺利。这让街区的会计们不快，他们抱怨连连。弗拉基米尔有许多优点，虽然他不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但总是很理智。可他并不是一位外交官，如果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警察忽然造访，他没有慌神，也没有低头哈腰，而是发了一通

^①凯塞尔（Joseph Kessel，1898—1979），法国作家。

火镇住了他们：‘我从来就没怕过 KGB^①，我可是活着从斯大林格勒出来的，你们可吓不倒我。我工作、纳税，我才不在乎你们！’他什么都不听。他从来不听劝告，一直如此。你都不会相信我所说的，他们把他关进了牢房，理由是他从事非法的会计师职业。他谩骂预审法官，判决前被羁押了四个月。你明白不？一个会讲六七种语言的家伙，他们封了他的事务所。于是他就破产了。你猜谁救了他？凯塞尔去拜访了法官，萨特支付了罚金。”

“那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在告发他的会计师那里打工，还挽回了客户群。他被剥夺了去参加考试拿到证书的权利。”

“萨沙提起过他两三次。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帮助你们。”

“我并不知道你和萨沙是朋友，我还以为你和伊果是朋友。萨沙，没人喜欢他。他是……”我看着他，帕维尔便不说了。我们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在一片闹哄哄的人声里，回忆又开始折磨我们。

“我和两个人都是朋友。”

“不可能同时是这两个人的朋友，这不可能。”

“对于我而言，这是可能的。有一天，萨沙告诉我凯塞尔为他支付过房租。当时他又拖欠了，不过不敢向凯塞尔要。”

“凯塞尔心地很好。直到最后，也就是去年，他一直都在帮我们。你看，我也一样，我表现得像个混蛋。不应该对任何人有任何期待。你做得好，别人就朝你脸上吐口水。他们都比我强大，但我没法忘记萨特说过的话、他放任别人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说出口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那么喜欢他。他是个讨厌的蠢蛋、客厅里的革命家。他很慷慨，但钱这东西也不能弥补他的过失。”

“那些年我什么都不懂。我年纪还小，以为他挺欣赏你。”

“我那时会讲笑话给他听，这让他觉得有趣。他虽然有好记性，却总记不住这些笑话，总是让我一遍遍重复。”

①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我还记得雷奥尼德，还有他那个关于斯大林与太阳的笑话。”

“是吗，说出来听听，我想听。”

“等一下，我要想一下。一天早晨，斯大林起床了。天气晴朗。他问太阳：‘太阳，告诉我谁是最美丽、最聪明、最强大的人？’太阳毫不犹豫地：‘是你啊！哦，斯大林，宇宙之光！’中午，斯大林又问：‘告诉我，太阳，谁是最历史上最闪耀、最出色、最卓越的人？’太阳回答说：‘是你，哦，伟大的斯大林。’晚餐前，斯大林喜不自禁地又问太阳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员。太阳回答说：‘你不过是一个病人，斯大林，一个精神病人，一个暴戾的疯子，我讨厌你，现在我要去西边了！’”

帕维尔哈哈大笑，就像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

“你笑话讲得真烂。法国人不懂怎么讲笑话。雷奥尼德讲这个笑话时，足足讲了一个小时。”

“的确如此，他讲的真的很有趣。你真的相信他把这个笑话讲给斯大林听了？”

“他真的讲过。雷奥尼德可不是会吹嘘的人。告诉我，你和他是朋友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很要好的朋友。我很想再见到他。”

“可是，他恨萨沙。”

“这不过是些没人感兴趣的老故事了。如今，都不重要了。”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应声，耸了耸肩膀。他又吃了一个羊角面包。

“你请客？”

“说实话，你那本关于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书，出版了吗？”

“你竟然提起这个！我一直都在重译、重写、修改、删略，但总有新的麻烦。我和一个年轻的出版商签了合同。最后我写了965页，他希望我能删减250页。我就再也不管了。”

“再给我讲一个笑话吧，帕维尔。”

“你知道一卢布与一美元有什么差别？”

我曾听过这个平淡无奇的笑话。如果真是这样，应该是他十五年前讲给我听的。我想了想，但还是没有答案。

“差一美元！”

他哈哈大笑，十分高兴。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米歇尔？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你的消息，后来你就消失了。”

“萨沙死后，我见过伊果与维内。其他人，你可见过他们？”

“除了你，其他人我都见过。”

1959 年 10 月—1960 年 12 月



1

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我们两家人聚在一起。说到底，到场的只是家人的一部分，但总归有二十多个人。生日那天我有不祥的预感。我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危险，但无法确认那究竟是什么。后来我弄明白了几个征兆，它们于我本应是了然可见的。可那时我年纪还小，并不理解它们，又沉醉于生日与礼物。我观察过我的同学，他们有一个家，只有一个；而我，我有两个，截然分开、从不往来的两个：马里尼一家与德洛奈一家，我父亲的家族与我母亲的家族。那天，我发现他们彼此讨厌。只有爸爸一个人一直跑来跑去，乐呵呵的样子，手里端着果汁盘，用伽本或者茹韦^①的语气说：

“想喝橙汁吗？您尝尝看，是鲜榨的。”

马里尼一家笑弯了腰。德洛奈一家则翻了个白眼。

“保罗，别那样，没什么好玩的！”妈妈很讨厌爸爸模仿别人。

她坐在那里和她的弟弟莫里斯说话，自从战后他在阿尔及利亚定居后，她再也没见过他。爸爸并不喜欢他。我呢，我挺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在开玩笑。他叫我卡拉汉^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见到我，迎面便说：“How do you do, Callaghan？”我不得不回答他说：“Very Good！”离别时，我又听见他说：“Bye bye, Callaghan！”同时，他会在我下巴上轻轻碰一下。

^① 伽本 (Jean Gabin, 1904-1976)，法国著名的电影演员。茹韦 (Louis Jouvet, 1887-1951)，法国著名的电影演员、戏剧导演。

^② 卡拉汉，英国作家皮特·切尼 (Peter Cheyney, 1896-1951) 的侦探小说及同名电影中主人公名为斯利姆·卡拉汉 (Slim Callaghan)。详情见后文。

莫里斯每年来巴黎一次，参加一项美国管理研讨会。他十分有幸成为第一个从新事物中获益的人，那便是管理学。他说话时夹杂着许多美式英语，没有人懂它们的意思，但是大家都假装很懂。他满口都是那个“如何成为赢家？”的研讨会。他为我妈妈解释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妈妈听得很入神。爸爸认定那是欺骗，少不了嘲弄他一番：

“您本该通知我，这样就可以让法国军队里的将军也去接受培训。”爸爸用戴高乐的语气说道。

他大笑，马里尼一家与他一起笑。这并没有使气氛有所缓和。莫里斯并不在意，继续说着话，并且鼓励我妈妈也去参加。退休后，外祖父菲利普将一切交给了女儿，他坚持认为她应该完善自己，而其实她在他身边做事已经十年了。在莫里斯的建议下，外祖父让她去接受一项名为“成为现代经纪人”的美式培训。她去了布鲁塞尔，参加为期两周的集训，带回一系列大部头书，这些书后来被庄严地供奉在书房里。她为此骄傲，那是她能力的见证与证明。这些书的内容，从“赢得挑剔的客户”到“构建有效的关系网”到“将潜在力量变成决定性力量”，应有尽有。每年，她都会参加在奥什大街奢华的会议中心举办的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会后家里红皮封面的藏书就会增加一本。去年，她陪莫里斯参加了名为“如何结交朋友”的研讨会，之后她便有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她总是露出一成不变的笑容，这是她现在以及未来成功的关键。她举止缓慢，这意味着她内在平和；她声音平稳而温和，这是她个人力量的表现。在达勒·卡内基这个讨论会的策划者看来，这一定会改变她的生活。爸爸并不相信。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在浪费时间与金钱。

“不管怎样，永远都不可能把一匹拉货的马变成优秀的赛马。”他盯着莫里斯，微笑着随口说了这句话。

一周前，我请求妈妈邀请马里尼一家。

“通常我们不邀请他们，我们家只有家人在一起庆祝生日。”

我坚持。她那新的笑容转眼不见。但是，我也不让步，表示如果他们不来就不要办生日会了。她悲伤地看着我，并没有改变主意。我只好作罢。当爸爸满脸坏笑地告知我已经邀请了马里尼一家，我开心地像发了疯。我相信，因为我，大家将会和解。我本不应该强迫妈妈，她并不认识他们。